◉深入学习党的二十大精神专论·教育篇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教育

汪明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教育,加快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发展素质教育,促进教育公平。”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教育,是我们党人民至上的根本立场和执政为民的基本理念在教育领域的生动体现,在“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实践中发挥价值引领作用,对加快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发展素质教育、促进教育公平提出了更高要求。

快乐成长。 视觉中国 供图

党的二十大报告对“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作出专门部署,提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教育,加快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发展素质教育,促进教育公平”,确立了新时代教育改革发展的价值基础和行动指南。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教育,是我们党人民至上的根本立场和执政为民的基本理念在教育领域的生动体现,在“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实践中发挥价值引领作用,对加快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发展素质教育、促进教育公平提出了更高要求。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教育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教育,彰显了中国共产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反映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的根本价值追求,彰显了教育发展为了人民、依靠人民,教育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的三大核心内涵。人民性是办好人民满意教育的逻辑起点和价值引领。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教育,对加快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提出更高要求。我们党始终把人民利益摆在至高无上的位置,把教育为人民服务作为教育的宗旨写进党的教育方针,建成了世界上最大规模的教育体系,不断推动教育事业实现从普及到提高的飞跃,不断满足人民对美好教育和生活的需求与向往。新时代新征程,应聚焦人民群众对更好教育的新要求新期待,加快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更好实现“幼有所育、学有所教”。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教育,对发展素质教育提出更高要求。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唯物史观的核心命题,以促进学生全面发展为目的、以提高国民素质为宗旨的素质教育,体现了教育对人的成长规律和教育规律的遵循,是教育的核心。尽管教育在百年党史不同时期承载着不同的历史任务,但在教育方针上总体呈现出立德树人的时代性主题。新时代新征程,发展素质教育、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必须着力构建德智体美劳全面培养的、更高水平的人才培养体系。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教育,对促进教育公平提出了更高要求。要抓住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教育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教育公平是社会公平的重要基础。新时代新征程,推动共同富裕不断取得成效、畅通向上流动通道,必须发展更加公平更高质量的教育,以教育公平促进社会公平正义。

加快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

教育体系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教育的价值承载,是建设全民终身学习的学习型社会、学习型大国的载体与依托。加快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必须着力构建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相适应、服务全民终身学习的现代化教育体系,加速实现各级各类教育的普及与质量的提升,保障人民群众“幼有所育、学有所教”不断取得新进展。

加快构建现代化教育体系。构建终身学习体系和学习型社会是未来教育体系发展的方向。坚持以终身教育理念为指导,构建正规教育、非正规教育和非正式教育相互结合,基础教育、职业教育、高等教育和继续教育相互衔接的教育体系,为每个个体生命成长发展的各个阶段提供各种教育机会。加快建立国家资历框架,实现学历证书和职业技能等级证书等值、互认,实现各类学习成果认证、积累和转换。因应信息技术的发展,多维度推进教育数字化转型,构建网络化、数字化、个性化、终身化的教育体系,形成“人人皆学、处处能学、时时可学”的学习型社会。

加速实现教育普及与质量提升。随着教育普及化程度不断提高,各级各类教育要适应人民期盼和发展需求,巩固提升普及水平。要加快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和城乡一体化发展,强化学前教育、特殊教育普惠发展,坚持高中阶段学校多样化发展,统筹职业教育、高等教育、继续教育协同创新,推进职普融通、产教融合、科教融汇,健全学校家庭社会协同育人机制,真正让教育改革发展为民造福,不断提高广大人民群众的教育获得感和满意度。

发展素质教育

“素质教育”是我国首创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教育思想,最初主要是针对基础教育领域,要求更加全面而有效地贯彻党的教育方针。新时代提出“发展素质教育”与早期提出的“实施素质教育”,在根本任务和价值使命上是一致的,都是着眼于提高国民素质特别是青少年素质,但在新时代赋予了新内涵。

构建全面培养的教育体系。新时代发展素质教育的出发点和立足点有了新的变化,一是从解决“应试教育”所产生的诸多问题转变为要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要坚持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德智体美劳“五育”并举,形成更高水平的人才培养体系。二是围绕培养“有理想、敢担当、能吃苦、肯奋斗”时代新人的要求,推动学科体系、教学体系、教材体系和管理体系改革创新与提质升级,并融入思想道德教育、文化知识教育、社会实践教育各环节,推进核心素养、学科素养在课堂教学和校内外教育中落地生根。

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教育评价事关教育发展方向,新时代发展素质教育必须从根本上解决教育评价指挥棒问题,以深化教育评价制度改革为突破口和抓手,统筹推进育人方式、办学模式、管理体制、保障机制改革。新时代,构建以发展素质教育为导向的科学评价体系,需要各主体协同发力,加速破除“五唯”的顽瘴痼疾,引导全党全社会树立科学的教育发展观、人才成长观、选人用人观。近年来,教育领域已陆续出台幼儿园评价、义务教育评价、普通高中评价、特殊教育评价等配套文件,教育评价改革向纵深推进。考试招生制度改革是素质教育机制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关键环节,要稳步推进中高考改革,构建引导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考试内容体系和考试方式,强化其对促进学生全面发展的重要导向作用。

促进教育公平

促进教育公平是国家的基本教育政策,要求着力解决发展中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健全以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为主要内容的教育公平保障体系,建成中国特色的学生资助体系,充分彰显出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教育的价值取向和政策导向。在教育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从“有学上”到“上好学”,教育公平的内涵和实现机制亟待升级,不断拓展教育公平的广度和深度。

发展高质量的教育公平。完整意义上的教育公平意味着公民享有公平的入学机会、教育过程中受到公平的对待、教育结束后能够得到全面而充分的发展。随着教育普及化发展,教育公平意味着教育要充分开发人的潜能,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与个性发展,让人们过上美好生活。发展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关键是要确立让所有学生在发展水平上都达到基本标准,科学合理配置公共教育资源,加快缩小区域、城乡、校际差距,完善督导评估制度,落实督导检查问责机制,确保所有的学校都达到基本质量标准。

实行有差异的教育质量公平。教育公平最终要实现不同学生得到最充分的发展,需要进行不同的资源分配即实施补偿性公平和差异性公平。一方面,根据每个弱势群体的特殊情况提供补偿性教育,如为贫困儿童、随迁子女、留守儿童提供特别帮助等,做到“补偿性公平”;另一方面,针对个体差异尤其是先天差异区别对待,如为身体残疾、智力低下、智力超常等儿童提供个性化教育,做到“差异性公平”。差异性公平的实质是贯彻因材施教原则,精准提供个性化教育和超常教育服务,从而为每个孩子提供适合的教育,让每个孩子都能成为有用之才。

(作者系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副院长、研究员)

◉教育前沿

如何评价高校数字化治理能力

翟雪松 顾建民

高校在国家治理体系中具有重要地位和作用,高校数字化治理能力是高校治理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数字化是教育系统性变革的内生变量,更是引领教育现代化发展的重要抓手和途径。近年来,高校相继组织和开展了数字化治理能力的评价研究,对高校数字化基础建设及教学应用起到了一定的引导作用。但现有的评价、实践大多未能充分体现以效能思想为核心的发展要求,出现了“盲投入”和“追热点”等问题。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评价导向上,缺乏从“投入—产出”视角审视各数字化投入单元的治理效能转化问题。我国高校类型多样、办学定位各异,各高校所处教育数字化发展阶段、水平各不相同,不能仅以投入体量为主要的评价标准。二是指标赋权上,各投入单元的权重配比以专家主观经验为主,缺乏以大数据驱动下的资源配比优化策略。三是结论呈现上,缺乏服务高校差异化发展的、实时动态的诊断性报告。现有数字化治理能力评价报告的呈现形式多以中长期的截面数据为主,缺乏动态、立体的数据分析,致使高校决策机构难以对数字化发展规划作出及时、高效的干预和调整。截面测评结果报告往往只给出同期各指标绝对值排名,无法实现不同发展阶段的纵向比较,也难以通过数据借鉴同类高校的发展战略,导致高校治理体系中数字化治理能力的判断缺乏个性化科学论据。

浙江省近年来改革了对属地高校的数字化治理评价模式,强化了效能意识,突出了治理现代化方向。在构建以效能思想为核心的高校数字化治理能力评价体系中重视“两个统一”,即教育数字化资源分配机制与产出效能相统一,数字化发展战略与学校发展定位相统一,逐渐形成了一定的工作经验。基于浙江省高校数字化治理评价实践,提出以下建议:

完善协同治理的首席信息官(CIO)组织体系。高校数字化治理需要各业务部门通力配合。建设校级和部门管理的首席信息官工作专组,是建立长效、协同治理体系的组织保障。由于高校各部门大多基于各自的信息系统工作,因此,学校需要建设校级和部门的数字化工作专组,形成“条块融通”管理模式,提高沟通和协作的效率,逐渐打破各部门数据和业务相对封闭的状态,统筹各职能部门协同开展治理工作。在学校层面进行整体的数字化治理系统设计、开发和建设,共同推进有助于数字化能力提升的机构重组。

优化数据驱动的效能评价方法。高校数字化治理能力提升要基于“两套数据,两个阶段”的评价体系。“两套数据”是指,数字化投入数据和绩效产出数据,这是两个评价阶段的实施基础;“两个阶段”是指,数据赋权阶段和效能转化阶段,其评价结论会为两个数据的迭代提供重要参考。

在第一个阶段,对信息化投入的指标进行“先放大、再优化”的策略。“先放大”是指,在指标筛选中充分吸纳教学、管理、科研、后勤等各类教育大数据,避免主观经验和滞后的技术体验干扰。“再优化”是指,通过计算信息熵等数理方法,对区分度不高的指标进行低赋权,对于完成度良好的指标进行高赋权。在第二个阶段,要将已赋权的投入指标与高校的产出指标建立效能转化模型。一方面,探索利用数据包络分析等“投入—产出”效能计算方法,结合高校教育数字化建设的实际情况,进行模型的筛选和优化,从中计算出各高校在各投入指标和建设规模上的合理性,并结合各校实际发展定位和需求对经费的优化分配提供科学论据。另一方面,打破传统的“数豆子”的生均信息化经费预算分配方式,及时对现阶段资源分配不当的院校进行预警和建议。

建设统一的高校数字化治理能力发展平台。要依靠数字化手段建设大数据平台,实现高效的数字化赋能。平台的建设思想要实现“两个转型”:一是将基于中长期的粗颗粒度宏观呈现,转型为对具体高校、具体指标的高清微距观察;二是将基于人工编码、填报、评价为主的方法,转型为数据自动采集和分析的一体化智能解决方案。

在“两个转型”基础上,建设全国性高校数字化治理能力发展平台,重点建设数据采集和诊断两项工作。通过对各高校常态化的数据采集,实现高校自身纵向的效能比较,也能通过横向比对来推荐与其发展目标和水平近似的“标杆院校”。在纵横交错的数据基础上,可以进一步优化效能算法。这样不仅有助于实现自动化实时诊断干预,更能为未来数字能力的政策仿真做好数据、模型等方面的积累。

数字化治理能力是各高校提高育人质量、转化科研成果、提升社会服务能力等方面的重要力量。完善和优化以效能思想为核心的高校数字化治理能力评价,不仅是促进数字化服务效能发展带动教育现代化的重要路径,更是激发各类人才创新创造活力、提升高等教育质量的有效路径。

(翟雪松系浙江大学教育学院特聘研究员、顾建民系该院教授)

◉问题探析

走进自闭症患者的内在世界

柳恒爽 黄天德

联合国大会2007年通过决议,从2008年起,将每年的4月2日定为“世界自闭症关注日”,以提高人们对自闭症和相关研究与诊断以及自闭症患者的关注。时至今日,自闭症被医学定名已近百年,但公众对自闭症的认知似乎仍停留在性格孤僻、天才、擅长画画等刻板印象的阶段。近年来,世界自闭症关注日开始倡导“消除误区、倡导全纳”及“让爱来,让碍走”。破除误区以正视听,或许才是真正全纳及关爱自闭症群体、为他们开发适切性教育方法的开始。

自闭症患者只是性格孤僻吗?

1943年,美国医学专家莱奥·坎纳首次提出自闭症的概念。自闭症是一个尚没有被全社会了解、掌握治疗方法的病症。无论是自闭还是孤独,似乎都将公众的认知导向了性格孤僻。

性格孤僻者通常表现出社交障碍,是自闭症的核心症状之一,而自闭症的另一大核心症状是“重复刻板行为”,却并不必然显现于性格孤僻者。相较单纯的性格问题,自闭者的症状在语言、情绪、感知、注意等多个层面均有体现。作为一种神经发育障碍,自闭症的症状注定会伴随神经分工的日趋细化而逐步呈现于自闭者行为的方方面面。其症状区间之广之杂,远非“性格孤僻”一言可蔽。

高功能自闭症患者都是天才吗?

公众频繁听闻的高功能自闭症之“高”,非指高于常人,实指高于患有自闭症群体的平均智商。自闭症群体因智商程度未达“中低”水平而被冠以“高”功能,但并不是传统意义的天才智商。

虽然绝大多数高功能自闭症患者并非天才,但天才在自闭症患者人群中的出现率的确高于普通人群。自闭症源于神经系统发育障碍,异常搭建的神经网络的确会因偶发的“神经超级连接”而拔高天才在自闭症群体中的出现概率。然而,患有自闭症的天才凤毛麟角。殊不知,远离公众视域的,才是自闭症群体中沉默的大多数,他们艰难挣扎,甚至生活难以自理。

高功能自闭症患者的功能高在哪里?

前文可知,智商是目前判定自闭症功能高下的准绳。但这一标准在现实面前却尽显“苍凉”,传统智商测验无法揭示自闭症患者逃避社交的核心短板,更无力探知自闭症患者专注细节的认知优势。

英国物理学家牛顿是一位高功能自闭症患者,他智商盖世,却终身未娶。可见,以智商标定的“高功能”和实际的社交功能之间存在一道鸿沟。

多数自闭症患者都很会画画吗?

不止一位自闭症患者描述过自己图片式的视觉思维:他们可以在脑海中“看”到数量、手感、性格这些无比抽象的概念。更有自闭者的视神经连接数量是常人的两倍。这种图片式思维可以赋予自闭症患者画画天分吗?

不可否认,视觉式思维的确成就了一些画家,比如荷兰后印象派画家梵高,借助画笔描绘出了一个“乐盲”的音乐感知。这种以“形”绘“声”的视听“联觉”为自闭症患者特有,也确为梵高的画作带来了独特的灵感和创意。但现实生活中梵高更多的是一位不喜欢画笔的自闭症患者。

自闭症患者多出现在“高知家庭”吗?

像智商、情商一样,自闭商是一种测查普通人自闭特质的指标。英国剑桥大学研究发现,理科生的自闭商显著高于文科生;理科生中,又以数学专业学生的自闭商为最;同时,物理学家、工程师、数学家的家族成员是自闭症的高发群体。细思这一研究结果,自闭症核心症状之一“重复刻板行为”似乎与较真钻研的理科思维有相近之处。

因此,自闭症多出现在物理学家、工程师、数学家等理科素养更显优势的家庭,而这些家庭又往往是高收入、高教育水平的“高知家庭”。

自闭症的发病率越来越高了吗?

美国疾控中心2020年报告显示,美国每54名儿童中就有1名患有自闭症,诊断率较之两年前提高了近10%。然而,诊断率的提升果真源于患病率的增高吗?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通过7次在加州的跟踪调查发现,生活在已确诊为自闭症儿童附近的孩子,更易获知自闭症相关信息,更易发现自身疑似症状,从而更易被诊断。越来越多的自闭症患者被发现而引发社群关注,导致更多原本潜藏在人群中的自闭症患者浮出水面。

前文提及的牛顿、梵高生活在不知自闭症为何物的年代,他们是按照去世百年后的诊断标准“被诊断”为自闭症的。难怪法国哲学家福柯认为,自闭症诊断率的提升,与其说源自发病率的提升,不如说源自公众防治意识的提高及自闭症、谱系等概念的普及。

防治意识的提高及潜在自闭者的入诊,归根结底依赖民众对自闭症的正确认识及对偏见误区的彻底抛除。这些研究新发现,也有利于特殊教育工作者去辨识患有自闭症或表现出自闭症倾向的学生,寻找到适合每个自闭症学生的教育教学方法,提高特殊教育质量,为这些学生及其家庭带来更多的快乐。

(作者单位系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科青年项目“汉语自闭症谱系障碍对含意理解的影响因素研究”[19YJC740045]成果)

与人工智能合作共生

于淼 张立伟

随着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不断涌向教育领域,信息技术对教育的影响已经从起步应用向融合创新发展阶段转变,教育数字化建设迈出新步伐。随之,数字鸿沟的内涵也发生了新变化,由物理鸿沟、技能鸿沟向智能鸿沟演变。如何平衡数字赋能与智能鸿沟的关系,通过智能技术赋能教育高质量发展,是教育数字化转型中面临的重要问题。

智能鸿沟广泛存在于国家与区域之间、群体及个体层面,其内涵不仅包含智能技术方面的差异,更意味着是否具备适应智能时代的计算思维、数据思维以及能力素养。教育领域智能鸿沟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由于支持教育智能化发展的智能基础设施、智能技术应用能力的不平衡,地区之间和城乡之间教育智能化发展状况还存在较大差异。《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教育信息化2.0行动计划》等一系列指导性文件已颁布,提出了教育智能化的目标和实施路径,在贯彻落实中要注意并弥合这些差异和差距。二是家庭对人工智能教育的理念、对智能素养的重视程度,因家庭经济条件不同而体现出较大差异。三是受城乡差异、学校信息化环境差异、固有习惯等因素的影响,智能素养在不同师生个体之间发展不平衡。

智能素养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孩子的未来,教育智能鸿沟怎样弥合?

第一,构建融入人工智能技术的教育云平台。国家教育主管部门全力构建国家数字教育资源中心,实现资源共享和用户互认,同时示范带动区域教育资源服务中心建设,形成多级、多方协同共建的数字资源公共服务体系。学校等主体将学校自有资源、国家和省级智慧教育平台、企业等资源进行整合,建立开放式、多场景的教育教学资源数据库,构建教师教学、学生学习数据采集系统等,从多个维度刻画教师教学状态和学生学习状态。

第二,推进智能技术与教育教学深度融合。要创新智慧教育教学模式,积极探索智能化教学应用场景,实现物理空间与数字空间的融合。要建立数据驱动的教学和诊断平台,为学生建立个性化的知识图谱,为学情诊断、综合评价和学生学业规划提供支持。要通过智能学习环境与社会实践有效联结等教学模式的重构,使教育教学以自主学习能力培养和学生个性发展为中心展开。

第三,着力提高师生智能教育素养。研发智能时代教师信息素养标准,开展教师培训,构建包含智能学习、交互式学习的新型教学模式。完善教师专业发展的评价体系,积极开展相关讲座、研讨、教学比赛等智能素养培训活动。培养学生运用智能化平台、工具和资源完成学习任务的能力,利用智能技术对日常学习生活中遇到的问题进行抽象、分析和建模的能力,不断提升学生高阶思维能力、综合创新能力和终身学习能力。

第四,建立多方参与的教育智能化协同机制。技术赋能的教育转型发展需要政府、市场、学校、家庭及个人的共同参与。政府部门加大对人工智能教育关键技术研发的投入;教育行政部门做好顶层设计和体制机制建设,制定教育智能化发展规划、评价体系、激励机制、监管方式等;学校需重新思考和定位教育教学的目标、模式和方法,积极运用智慧教育生态环境;加强与人工智能企业的合作和交流,探索适宜于学校自身发展的融合模式;发挥市场在教育智能化中的作用,积极引导人工智能相关企业参与教育智能化建设,供给相应的智能化产品和服务;家庭和个人应主动应用人工智能教育产品和服务,增强智能素养,不断提高学习效率,实现人工智能与人类智能的合作共生。

(作者单位系青岛理工大学)